



族群互动与生存性智慧

——以凉山彝族为例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1)04-0020-07

●巫 达

[摘要]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历史上,在这个区域曾经出现过大大小小 17 个族群名称。为了争夺自然资源及政治资源,这里族群冲突频发。本文试图借助彝文古籍探讨彝族先民在复杂的族群环境中的互动策略,结合笔者多年的田野调查材料和个人经验,勾勒出彝族人在复杂社会环境下的“生存性智慧”。

[关键词] 彝族 族群互动 生存性智慧 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境内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全州面积 60 423 平方公里。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州常住人口为 4 532 809 人,其中汉族人口为 2 155 357 人,占 47.55%;少数民族人口为 2 377 452 人,占 52.45%。全州彝族人口为 2 226 755 人,占 49.13%。(凉山州统计局 2011)凉山州的世居民族除彝族和汉族之外,还有藏族。大体上讲,在这个州的境内,交通枢纽地区多为汉族聚居区域,凉山腹地地区为彝族聚居区域,凉山与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省凉山州民族文化研究基金委托课题研究成果之一。根据 2010 年 6 月 4 日至 6 日参加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召开的“‘生存性智慧’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修订而成。

甘孜、云南等藏族地区交界的地区为藏汉彝杂居区域。彝汉藏三族杂居的多族群社区,是考察族群关系的重要区域。在各族群成员与其他族群成员交往、交流、互动的时候,不仅有相互冲突的现象,同时存在族群之间相互尊重、共同繁荣的族群和谐景象,而这种族群和谐景象后面蕴藏了深邃的族群互动智慧与策略。

从人类学的族群研究理论脉络来看,族群性可以从多个维度(dimension)去探讨理解,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是把族群性作为一种观察的方式(ethnicity as a way of seeing)。在族群性这个维度上,紧密联系行动结构,就是面对人们理解和解读世界的方式,是使生命变得更有意和具有可预见性的方式。族群成员根据认知社会世界的“认知地图”来界定自己和他者的位置。(Karner 2007:31)为了和平共处而产生和发展的族群互动的策略,是各族群生存性智慧的结晶,体现了各族群相互交往的惯行准则。在认知到本族群与他族共处惯行准则之时,各族群的文化认同方有可能实现。本文介绍凉山地区的彝汉藏三族互动的历史与现状,并借助彝文文献探索凉山彝族的生存性智慧。

二、和谐族群关系的传说与记载

在凉山州的甘洛县、越西县,彝族、藏族尔苏人都流传着藏、汉、彝三族来自同胞兄弟的传说。凉山彝文经典文献《勒俄特依》(“中国彝文典籍”译丛编委会 2006)描述:三兄弟生下来之后不会说话,他们的父亲居木武吾委托动物朋友上天庭去打听他们不会说话的原因及疗法。经过多番努力,动物朋友打听到需用爆竹声音来治疗。

居木武吾家,听后忙不停,深谷砍了三节竹来炸,家中烧了三锅水来烫。首先烫长子,说声俄底俄夺,成为藏族的始祖,蹲起双脚坐。然后烫次子,说声阿兹格叶,成为彝族的始祖,跳到竹席上面坐。最后烫么子,说声毕子的咯,成为汉族的始祖,跳到门槛上面坐。武吾三子啊,三子三样话,互相听不懂。(摘自《勒俄特依》,“中国彝文典籍”译丛编委会 2006:51)

这三兄弟的顺序很有趣,在凉山,人数最少的藏族尔苏人(汉语亦称为“西番”、“番族”)①是“长子”,历史上人数比藏族多、比彝族少的汉族是“么子”,历史上人口最多的彝族是“次子”。这种排序,据笔者调查过的藏族尔苏人的看法,是因为历史上藏族人口多、占地宽,所以,传说里记录为“长子”,彝族之所以为“次子”,是因为它比藏族尔苏人进入凉山晚。《勒俄特依》还详细地叙述了藏、彝、汉三族分布的区域。与藏族尔苏人的传说不同的是,在《勒俄特依》里,“老么”汉族人住平坝,“老二”彝族人住高山峡谷间,而“老大”藏族人则住在高原上:

武吾三子啊,分住在三方。武吾拉叶是汉族,数他见识广,垒石做地界,所有平坝被他占,住在海湖水边。武吾格子是彝族,挽起草结做地界,住在高山峡谷间,内称古侯曲涅支,外称阿布阿尔支。武吾斯沙是藏族,插起木牌做地界,住在高原上,境内称藏族,境外称喇嘛。藏族的姓氏:俄洛洛,俄色施,俄喇嘛,俄基子,俄地拖,俄子哥,俄基基,俄博都,俄坡劈。藏族分九支,分住在九处。汉族分三支,分住在

① 详见巫达.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个案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三处,分为白汉和黑汉。汉族繁衍无数量,四面八方都住遍。彝族为一支,居住在一方。(摘自《勒俄特依》,“中国彝文典籍”译丛编委会 2006:51)

事实上,藏族的人口数量与汉彝差别是非常大的,仅以凉山州甘洛县为例,彝族人口差不多是藏族尔苏人人口的 60 倍。甘洛县是一个多族群的县份,主要由三个民族构成:彝族、汉族和藏族尔苏人。根据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县共有 148 008 人,其中彝族 99 262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62%),汉族 54 269 人,藏族尔苏人 3 305 人。(甘洛县统计局 2001)^①虽然藏、汉、彝三族人口有差异,在历史上也发生过或大或小的族群冲突,但是,彝族文献典籍和藏族的口述历史都说凉山地区藏、彝、汉三族为一母同胞,说明历史上三族曾存在和谐的族群关系。

三、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族群关系

虽然彝人、藏族尔苏人有三族来自同一个祖先的传说,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三个族群边界明确,并不相互认同为同一个族群。反映在婚姻方面,三族人传统上是互不通婚的,只是在近几十年来才出现少数通婚个案。通婚是多个族群杂居在一起时相互影响、互相融合的一种基本形式,从通婚情况可以看出族群互动、文化涵化等情况。甘洛、越西两县的藏族尔苏人、彝人和汉人之间虽然有通婚现象,但主要是在城镇里参加工作的人之间存在,在农村是较少看到三族通婚的现象。2002 年笔者到甘洛县作博士论文调查期间,专门访问了甘洛县民政局,了解了甘洛县境内三大群体(藏、彝、汉)之间的通婚情况,特别是了解了藏族尔苏人与其他两个族群的通婚情况。根据民政局的结婚登记表统计,在 2001 年,甘洛县全县有 851 对新人登记,其中整个县级机关有 70 对新人登记,占全县当年登记数量的 8%。男方是汉族、女方是彝族的有 5 对,占整个县级机关登记的 70 对新人的 7%;男方是彝族、女方是汉族的有 9 对,占 13%;1 对男方是汉族,女方为回族,其余都是同族登记。具体见表一:

表一 2001 年甘洛县族际通婚比例表

汉彝	汉藏	彝汉	彝藏	藏汉	藏彝	其他
5	0	9	0	0	0	1
7%	/	13%	/	/	/	/

(资料来源: 笔者的统计记录)

另外,笔者还统计了甘洛县县级机关 2002 年上半年(1~6 月份)族际通婚情况。在这半年里,有 52 对新人结婚,其中男方为汉族、女方为彝族的 4 对,占总数的 8%;男方为彝族、女方为汉族的 1 对,占 2%;男方为汉族、女方为回族的 1 对,占 2%;彝族与彝族结婚的 6 对,占 11%;藏族与藏族结婚的 1 对,占 2%;其余 39 对为汉族族内通婚,占 72%。列表如下:

表二 2002 年上半年甘洛县县级机关族际通婚比例表

汉彝	汉藏	彝汉	彝藏	藏汉	藏彝	彝彝	藏藏	汉汉	其他
4	0	1	0	0	0	6	1	39	1
8%	/	2%	/	/	/	11%	2%	72%	2%

(资料来源: 笔者的统计记录)

在拉吉沽村村民和鹏俄依傍支的个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藏族尔苏人、彝人和汉人三个

^①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暂缺,这里仍用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族群之间通婚很少。在拉吉沽村 56 户村民中,只有 1 个上门的汉族女婿和 1 个彝族妻子,其余 54 户都是尔苏人族内婚,而且这两例异族通婚现象都是有特殊情况的。那位上门的汉人是一位脚有残疾的人,在他的老家汉源县九襄镇,已经没有直系亲戚。这位汉人的伊萨姓尔苏妻子是一位弱智人。这例婚配是在女方哥哥的撮合下成功的。人们觉得他们是特殊情况(都有生理缺陷),所以才容忍了这桩婚姻。一位 50 多岁的妇女对笔者说:“主要是伊萨家那个女子头脑有问题(指弱智),所以才招了一个汉人女婿上门。不然,怎么会嫁给一个汉人呢?”另一个娶了彝族妻子的尔苏男子也是有特殊情况的。他患了尔苏人认为非常严重的传染病——麻风病,尔苏人不愿嫁给他,于是他从甘洛县娶回了一位有相同疾病的彝族妻子。在拉吉沽村,他们家单独安在村子几里以外的地方,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家后也住在他家旁边。对于麻风病,彝族人最为畏惧,麻风病人只能同麻风病人婚配,麻风病人的直系亲属也被视为麻风病患者。

鹏俄依夸支的 99 个成家的男子当中,只有 1 个娶了金姓汉人妻子,其余的都娶本族尔苏人妻子。那位娶了汉人妻子的人是干部,目前住在越西县城,他是在参加工作以后才娶的那位汉人妻子。鹏俄依夸支 71 个已经出嫁的女性当中,有 4 位嫁给了汉人,1 位嫁给了彝人。其中 1 位是因为原来的尔苏人丈夫去世,改嫁给越西县城 1 位廖姓汉人。另外 3 位嫁汉人的目前都生活在成都附近的汉区,其中 2 个在大文豪苏东坡的故乡眉州市(习惯称眉山县),另 1 位嫁在绵阳市。嫁给彝人的那个女子也是参加工作以后才嫁的,她现在在越西县城工作,丈夫彝姓甲卡,是她所在单位的小车专职驾驶员。

从尔苏人与彝人、汉人的通婚情况中可以看到分明的族群边界。虽然在地域上他们是不能分开的“三兄弟”,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他们成为竞争对手,成为相互排斥的不同群体。虽然在新的社会格局下,在城镇里面出现了族际通婚的现象,但是在未来长期一段时间里面,不可能出现大规模跨越“我们”和“他们”之间鸿沟的现象。

彝族的家族和家支是族群认同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一个人如果能说出来自己属于凉山彝族某一个家族或家支,就会被毫不怀疑地认同为彝族。彝族等级制度是一套不同于古代中国、古代罗马、古代印度的特殊制度,这个制度把彝族严格分为诺、曲诺、阿加和嘎西四个等级。某人如果说自己是这四个等级中某一等级的成员,也会被毫不犹豫地认同为彝族。(巫达 2008)

彝语称汉族叫“汉家”(hxie mgat^①),“汉家”单独说时泛指所有汉人,但是前面加了修饰词就有了一些特殊含义。“外地汉家”(hxiex die hxie mgat)意为外地汉人,多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入凉山的新移民。“凉山汉家”(niep sha hxie mgat)则指老移民,在特定的情况下指被卖入凉山的“汉根奴隶”,是指 1958 年凉山进行民主改革以前被卖入彝族地区的人,也即奴隶。凉山彝族奴隶的来源多种多样:有本民族内没有势力、没有家支保护,被任意买卖的人;有被掳来的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最多的是周边的汉人。(巫达 2008)这里说的“凉山汉家”是专门指最后一种。甘洛彝族炫耀财富和地位的方式是计算骏马和奴隶的多少,有一句口头禅说:“我走不了路了就买马骑,做不了活了就买‘汉家’来做。”甘洛山高水险,地形复杂,奴隶一旦被卖入甘洛,就很难逃出去,因此彝语谚语说:“石头掉进水里就浮不起来了,人被卖进甘洛就逃不出去了。”从土质和气候来看,甘洛又是一个很适合种植罂粟的地方,彝族因为种植而有钱购买奴隶。为了获得奴隶,一些彝人铤而走险,对汉族地区直接进行武装掳

① 本文所用的彝语注音采取 1980 年国务院批准推行的《彝文规范方案》的拼音方案。

掠,一些有军事势力的汉人直接参与人口贩卖。《甘洛县阿尔乡社会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2011)记载:

一个叫汪正清的甘洛田坝镇汉人,1936年当上国民党军队的中队长后,从邻县以招新兵为名把人骗去卖到彝族地区。他每年要卖90到100人,持续卖了五六年时间。别人责问他时,他争辩说:“上面不发饷,我没有办法,只得卖兵来养兵。”还有古诚斋、宋克明、王贺氏、钱国安等田坝汉人以雇用力夫为名,骗来力夫卖进彝族地区。还有一些人因为欠债、抽鸦片破产等原因,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卖进彝族地区为奴。由于这些原因,“汉家”在彝族地区的人数不断增加。据曾被卖进甘洛县吉米镇的李清全说(上个世纪60年代)仅阿嘎乡、波波乡、吉米镇三个地区就有300多个单身“汉家”以及300多户成家的“汉家”,这些人已经全部“彝化”。有些人的祖父母是被卖进彝族地区的汉人,自己又干起贩卖奴隶的勾当。如阿尔乡的白助尔哈和卡别日卡的曾祖父和祖父就是汉人奴隶,自己后来成为有名的奴隶主。^①

“凉山汉家”现在已经“彝化”,多数跟从他们主子的姓,报的民族成分也都是彝族。自从1958年民主改革后,他们获得了人身自由。他们对于族群的认同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已经认同为彝族,彝族和当地汉族也认为他们是彝族;另一方面,他们也认同汉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汉人,血统是汉族,当地汉族和彝族也又认为他们是汉族。“凉山汉家”在拥有两种认同的同时,却受两重歧视。当地汉族称他们是“蛮汉人”,因为当地汉人对彝族的一种蔑称是“蛮子”;彝族也歧视他们,很多自认为等级高的彝族不愿意和他们通婚。

由此可见,不管目前凉山地区的彝、汉、藏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各方面有什么样的变迁,毋庸置疑,在过去一个世纪,三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不断有冲突和竞争。

四、族群互动策略的文化表述

一个区域的不同族群往往存在一些偏见,这些偏见是一个族群如何看待和处理与另一个族群之间的关系的写照。例如饮食方面,彝族对肉有一种很复杂的态度。如果一个人看见别人家正在宰杀牲畜,他看见了血,他就要等到吃饭时吃上肉,否则认为会被一种怪病(大脖子病)缠身。宰牲畜的主人家一定要邀请这个人到家吃上肉。如果有谁打着了猎物,所有看到这个猎物的人都有份。笔者记得,小时候有一只麂子被猎狗追进了我们村旁边的河里,周围的人们听见狗叫声,都出来追那只麂子,我们几个小孩子也出于好奇赶去看热闹。麂子被从河里抓上岸以后就在河边宰杀,麂子的肉平分给在场的人,不管男女老少,每人分得拳头大小的一块麂子肉。然而,有这种见者有份的吃肉习俗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到别人家作客时可以放开肚子吃肉,实际上,吃多了肉的人是会被人耻笑的。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到别人家作客,主人家如果杀了猪羊等大家畜,客人最多

^① 以上关于甘洛奴隶买卖的材料来自四川民族调查阿尔小组的《甘洛县阿尔乡社会调查》,载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之一《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

只能吃三块肉。每块肉大约有拳头大小,当地汉语叫拳头为“砣子”,因此把这种大小的肉叫“砣砣肉”。如果杀的是鸡鸭等家禽,客人则只能吃一块肉,甚至只喝一点汤,为的是把肉留给主人家的小孩子吃。多吃肉被认为是丢脸的事情,为人们所不齿。如果一个人要劝另一个人多吃肉,这个人可能会半开玩笑地说:“我又不是汉人,你为什么劝我吃这么多肉?”在彝族的眼里,汉族在吃肉方面很不讲“礼”,不会照顾别人,特别是不会照顾小孩子。这显然是一种偏见。

彝族谚语说:“肉是孩子吃的,酒是老人喝的。”还说:“一个人值一匹马,一匹马值一瓶酒。”酒在彝族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探亲、访友、奔丧、接亲、讲和等等许许多多事情,都少不了酒,因此到处可以看到彝族喝酒的场面,甚至可以看到彝人喝醉后倒头睡在街头的情形。但是彝族最看不起喝醉的人,讲究喝酒时“喝一碗价值一块金子,喝两碗还值一块银子,喝了三碗喝醉的人,连一条狗都不如。”讲究喝酒要有酒德,保持形象,适可而止。而在汉人那里,大概他们所见到的彝人几乎都喝酒,于是汉人对彝人的偏见之一是彝人好酒。如果一个汉人看到一个彝人不喝酒,他可能会很奇怪地说:“哪里有彝族不喝酒的?”言下之意是怀疑这个人不是真正的彝族。关于这种彝汉之间的偏见,有人总结了一则顺口溜:“彝人见酒,打死不走;汉人见肉,打死不流。”(“流”是四川汉话“动”的意思)

在彝族观念和文化隐喻里,彝族和藏族之间的差异就如同黄牛与水牛之间的差异,虽然都是“牛”,却是不相同的,所以不能通婚。彝族和汉族之间的差异就如同绵羊与山羊之间的差异,虽然都是“羊”,却仍然是有差异的,因此不能通婚。彝语“尔比”里有大量体现“生存性智慧”的语句。“尔比”(ly byx)是彝语词的音译,相当于汉语中的“格言”、“警句”、“谚语”、“成语”等。尔比语句精炼,含义深刻,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有体现凉山地区的族群特征的:“彝富作大斋,汉富建房屋,藏富敬菩萨。”有表达对外的“外交”态度的:“我不强,强人不软。”“待客之日莫节俭,作战之日莫怕死。”“对内交朋友,对外抗仇敌。”“对外要强硬,对内要和蔼。”有体现有备无患的:“白天不修圈,夜晚不防狼。”有表示励志、自强态度的:“自身不能撑起来,别人不会撑起你。”有表达合作互助态度的:“自己的头别人剃,别人的头由我剃。”在处事哲学方面强调不要轻易招惹是非:“自己的头没有虱,不捉别人虱来投。”有激励战士的:“拔矛入手中,不杀是耻辱,出兵立阵上,不战也羞耻。”有表达占有意识的:“三年不争地,地将归别人;虎豹不走径,径将归别兽。”有对敌战略方面体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态度的:“打进屋内来的蛇,打跨火塘的蛤蟆。”有面对多元文化的情况,强调顺应文化多元的态度的:“跟彝人说彝话,彝话明朗朗,随汉人说汉话,汉话响铮铮。”“跟汉人就蓄胡子,跟藏人就蓄发辫,跟彝人就挽发髻。”有体现族群社会网络的:“亲戚在彝地,我在彝地勇;亲戚在汉地,我在汉地雄。”“汉区贵印章,在四方使用,彝区贵亲戚,住遍大地上。”“我亲在彝地,我眼望彝地;亲戚在汉区,我眼望汉区。”等等。这些尔比处处体现出睿智的生存性智慧。

综上所述,彝族人在与汉族、藏族长期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族群互动策略,并反映在彝族尔比里面。这些体现着生存性智慧的尔比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地方性知识,成为彝族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

五、结语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提倡的阐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

pology) ,使人类学变得与语言学越来越相似。阐释人类学不赞成像揭示隐喻的“语法”那样去解读和记录不同的文化,而是提倡通过一种类似语言翻译的手段[格尔兹称之为“深描”(thick description)]阐释不同的文化,使之成为能够被其他文化所理解的“语言”。(巴纳德 2008 :170)在多族群聚居和杂居的区域,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和交往,需要借助一定的文化翻译式的阐释,从而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本文所展现的藏、彝、汉三族之间的族群互动和和谐策略,正是通过“翻译”和“阐释”的途径使三族间相互理解的。这些基于多族群相互理解的惯习,成为凉山地区千百年来生存性智慧的体现与结晶。

后现代思潮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渗透到人类学领域,其中,克利福德和马库斯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Clifford and Marcus 1986)一书是一部标志性著作。该书拒绝所谓“科学方法”的人类学幻象,提倡对书写的重要性重新认识。该书认为书写是这样一种尝试,它通过人类的理解力而不是所谓正式的研究和分析方法获得洞察力。(巴纳德 2008 :171)同理,本文所阐述的凉山彝族在与汉族、藏族互动过程中的生存性智慧是通过理解力得以洞悉的,而不是通过所谓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分析方法获得的。族群互动是多族群区域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族群互动策略作为一项长期的生存性智慧的积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理解力加以理解并加以总结。彝文典籍作为记录彝族社会文化历史的工具,保留和重现了彝族人的族群互动策略。这些互动策略作为人类生存性智慧的地方性知识,对理解和阐释世界各地多族群区域的族群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英文摘要见 P.90)

参考文献:

- [1] 艾伦著·巴纳德,王建民等译. 2008. 人类学历史与理论[M]. 北京: 华夏出版社。(译自 Alan Barnard : 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0.)
- [2] 甘洛县统计局. 甘洛县统计年鉴[Z]. 甘洛: 甘洛县统计局编 2001.
- [3] 凉山州统计局. 凉山州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期)[EB/OL]. 凉山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lsz.gov.cn> 2011 年 5 月 23 日。
- [4] 巫达. 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 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8.
- [5] 巫达. 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 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个案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 [6]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 [7] “中国彝文典籍”译丛编委会. 中国彝文典籍译丛[M].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6.
- [8] Clifford, J., and G. Marcus,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中文版: 詹姆斯·克利福德和乔治·E·马库斯. 写文化: 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9] Karner, Christian. 2007. Ethnicity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收稿日期] 2011-07-23

[作者简介] 巫 达 彝族,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博士生导师, 上海大学族群研究中心主任。上海 200044

就业状况的恶化,并进一步导致黑人暴力犯罪率的上升,因此少数族群之间的矛盾化解需要社会学家的特殊关注。在统一的国家公民意识尚未完全建立、各族群的群体意识很强的情况下,资源和发展机会的分配矛盾很容易导致以族群为单元的群体冲突,欧洲国家和美国处理这些矛盾的思路和具体措施,值得我们借鉴。

这四种学术期刊的作者和读者主要来自西方工业化社会,作者们主要的研究对象也是西方社会,而中国在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时肯定遇到明显的国情差距,但是这一点并不应当妨碍我们从这些论文中吸取经验、知识和智慧。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既存在许许多多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上的“异”,同时也存在科技发展规律、市场运行机制上的“同”。每个国家的社会,都是在与历史的纵向比较和与其他国家经验的横向比较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而得以前进的。中国当前在许多领域面临重大危机,自然资源的竞争使中国南海和东海的主权面临其他国家的挑战,在非洲的投资和市场开拓也遇到国际势力的围堵和诬蔑,南亚形势的紧张也使中国西部边境安全出现隐患,同时国内许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和加剧,社会管理制度不完善和管理人员素质低下使许多地区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和效能,特别是西部少数族群地区的许多社会矛盾、认同冲突也在逐步显现。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对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具有必要的风险意识。了解西方各国处理社会矛盾的策略与效果,注意吸收西方社会学家在分析社会结构变迁、分析社会运行机制演变、分析处理种族—族群矛盾方面的具体思路,探讨各种应对政策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对于中国在今后加强社会管理、建设和谐社会肯定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收稿日期]2011-09-09

[作者简介]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1

马雪峰,男,回族,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博士。
昆明 650091

Ethnic Interactions and Living Wisdom: Taking Liangshan Yi as an Example

Wu Da

Abstract: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Sichuan is the biggest Yi community in China. There had been 17 ethnic groups living in the area in history. Aiming at na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they fought with each other from time to time.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al strategy found in ancient Yi books and the author's years of fieldwork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Yi's living wisdom in complex soci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Yi; ethnic interaction; living wisdom; anthropology (See P.20)

A Report on the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the Arctic: Along with Some Ideas on Ethnographic Writing

Ding Hong

Abstract: Based on an ethnological fieldwork, the author records the reindeer culture and the life of Nenets who are living in Russian Arctic. Along with that, the author discusses related issues concerning ethnographic writing, especiall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overseas ethnography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ethnology.

Key words: the Arctic; investigation; Nenets; ethnology; ethnography (See P.33)